

社会保障的力量传导与质量提升^{*}

——兼评“福利病”论调

杨方方

摘要：以促进社会公平为己任的社会保障是推进共同富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由于现有研究未能清晰呈现社会保障力量的作用机制和传导路径，导致歪曲社会保障力量的“福利病”论调——“社会保障供给水平高一助长人力惰性—社会发展受阻”大行其道。固然，人力的流动和行动将社会公平的衍生效应带到更广阔的领域，人力是社会保障力量的载体，但人力承载的社会保障力量源于质量而非数量，数量与质量之间至少隔着理念价值、分配结构、供给内容和方式等多重因素。社会保障力量的传导过程可概括为：“社会保障质量—社会公平促进—人力成长—社会全面发展”。从物质层面来看，社会保障的力量传递过程“物质转移—收入平等—人力改善—经济循环”并非天然通畅，每两个节点的连通都需相应心理能量和精神力量的助推；精神层面上的“身安—心安—心动”是积极行动产生的前置传导环节。鉴于此，社会保障的质量设计应以增强心理能量和精神意蕴为指向，促进物质资源向精神动力的内化，激发积极行为，全面改善社会生态。

关键词：社会保障力量；社会保障质量；物质转移；心理指向；精神力量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 (2023) 02-0154-14

作者简介：杨方方，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DOI:10.13644/j.cnki.cn31-1112.2023.02.001

一、现有研究局限与狭隘论调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①可以说，共同富裕是多系统协调推进、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齐头并进的过程；是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相互转化和促进的过程。在这个进程中，社会保障是走向共同富裕、建设福利中国的重要制度支撑。加强和改进社会保障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②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项目编号：21STA002）的阶段性成果。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2 年，第 22、27 页。

② 参见郑功成：《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经济日报》2022 年 10 月 26 日，第 11 版；郑功成：《共同富裕与社会保障的逻辑关系及福利中国建设实践》，《社会保障评论》2022 年第 1 期；何文炯：《建设适应共同富裕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评论》2022 年第 1 期。

之所以社会保障被赋予更高期待，源于其核心目标价值——社会公平能在共同富裕进程中释放巨大的力量：向内，其能促进人的发展，此乃共同富裕目标的核心指向；向外，其能为其他系统提供坚实助力，共同富裕是全社会系统推进的结果。一项事业的力量源自目标价值实现的能力。目标是一项事业的发展指向和主动追求的理想图景；目标向纵深延伸、化为服务对象的内在能力，可称为效力；力量载体与其他领域的互动产生的积极效应是目标的外扩、横向辐射，可称为功能。内化的效力和外化的功能都是一项事业凭借目标实现而释放出的力量。一项事业的力量传导链条可归纳为：“目标—效力—功能”。社会保障具有多重效能，其通过助力人力成长释放着补偿与矫正收入分配差距、提升国家和社会认同、引领观念认知和促进经济发展等巨大力量，全面改善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以高福利著称的北欧模式无疑是“隐性支点”角色的典范，北欧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建构上多始于“为了福利而增长”的目标导向，^①实践上收获了“因福利而增长”的结果，形成了“社会保障高投入—高技能劳动力—人力资本价值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社会保障高投入”的良性循环。从中我们可提炼出社会保障力量的传导路径：“社会保障供给—人力资本增长—社会全面发展”。社会保障的巨大功效催生了社会投资理论的发展，“为了增长而福利”成为推动社会保障实践的支撑之一。^②因此，社会保障如何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出更大力量是具有重要时代价值的议题。

遗憾的是，现有研究未能清晰提炼社会保障力量的传导路径，也鲜有涉及社会保障力量的构成、载体、媒介以及传导节点等实质性问题，难以支撑起新时代社会保障发展需要。有关社会保障力量研究主要集中在两端：一端是社会保障与其他系统的关系，^③看似观点争鸣，实则由于时间跨度、样本范围、社会保障的核心变量、中介变量选取等各种表层因素和认知基础差异，研究之间难以形成有效的对话；另一端集中在社会保障特定项目在特定时点对特定群体的影响，研究方法以定量研究为主。^④实践中，社会保障对多个系统的影响是长链条、多环节、多层次、多方向的互动过程，定量聚焦一个个孤立的点很难形成持续循环的系统研究，也很难贴近社会保障与世界互动的真实图景。其实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系统互动时更多以集成性系统的面貌存在。社会保障夯实地基、肥沃土壤的生态优化功能决定了集成性思维和动态持续研究应当是前提和基础，零散、孤离的定量研究只能作为辅助和填充。社会保障的重要价值是通过各个子系统、不同项目相互配合实现的，不同项

① 克劳斯·彼得森、陶冶、华颖：《为福利而增长还是为增长而福利？北欧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之间的动态关系》，《社会保障评论》2019 年第 3 期。

② 20 世纪 90 年代，国家干预主义与自由放任主义被证实并不可靠，“社会投资国家”理念开始凸显，社会保障的投资收益越来越被重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部分如下：米基利 1995 年出版的《社会发展：社会福利中的发展型报告》中提出发展型社会福利模式；安东尼·吉登斯 1999 年出版的《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的复兴》中提出了社会投资型的积极福利制度；埃斯平·安德森等 2002 年出版的《为何我们需要一个新福利国家》创造性地运用生命周期理论完善和拓宽了社会投资理论；2012 年莫雷尔等出版的《通往社会投资福利国家：思想、政策与挑战》提出社会投资正在成为一种政策范式；赫梅尔赖克 2013 年出版的《改变福利国家》与 2015 年出版的《社会投资带来静静的范式革命》进一步完善了社会投资理论。

③ 比如在社会保障支出与消费增长、经济发展关系上，研究结论存在诸多分歧。持正向观点的部分研究有：丁纯认为，社保支出可以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拉动居民消费和促进创新产出，从而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发展；李乐乐和秦强认为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发展具有正向影响且该影响有显著的地区差异。参见丁纯：《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来自欧洲的证据和启示》，《社会保障评论》2022 年第 5 期；李乐乐、秦强：《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发展》，《经济问题探索》2020 年第 5 期。持负向观点的部分研究有：晋华和蒋小仙认为社会保障整体支出规模显著抑制了区域经济增长，社会保障支出越多，经济增长就越缓慢；牟娟认为社会保障支出对居民短期内的经济诉求有促进作用，但长期看，对经济增长起负向作用；魏勇和杨孟禹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个人社会保障行为会对居民消费升级产生重大程度的抑制作用。参见晋华、蒋小仙：《科技创新、社会保障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 SDM 的分析》，《科技与经济》2020 年第 3 期；牟娟：《社会保障、人力资本支出对经济增长的统计检验》，《统计与决策》2020 年第 13 期；魏勇、杨孟禹：《收入结构、社会保障与城镇居民消费升级》，《华东经济管理》2017 年第 3 期。

④ 以对收入差距调解和消费促进为例，吕承超等基于社会保障系统的各个子系统和项目展开，认为社会保险支出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而社会优抚支出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其他项目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明显；张开然、胡鑫怡认为整合型医疗保险显著降低了家庭医疗负担，大幅促进了生存型、生活型、发展型和享乐型消费支出，且对农村居住家庭和原新农合家庭作用更大；罗浩、周延认为养老保险降费对户主年龄较小群体、家庭养老保险参保率较高群体、中低收入群体、家庭不健康率较低群体的消费不平等有显著减缓效果，等等。参见吕承超：《中国社会保障支出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吗——基于规模与结构的动态面板模型分析》，《农业技术经济》2017 年第 5 期；张开然、胡鑫怡：《整合型社会保险能释放更多消费吗——基于居民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准实验研究》，《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2 年第 7 期；罗浩、周延：《养老保险降费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消费经济》2022 年第 5 期。

目的使命价值与运营机理各有侧重。以财务平衡原则为例,既有单一维度,也有复合维度。仅从时间维度看,就有生命周期平衡、逆经济周期平衡、年度平衡和定期测算等多种原则。在不了解“森林”全貌的情况下,把集成性系统拆分,来评估每个“树木”并不一定能“格物致知”。

这样一来,狭隘、歪曲社会保障力量的论调就有了生存空间,“福利病”“福利陷阱”“福利危机”等词多年来大行其道。^①虽然“福利病”论调承认社会保障影响人力成长,特别是对人的进取心、精神面貌具有重要影响,但竟然得出一条窄化、歪曲的社会保障力量传递链:“社会保障供给过度一助长人力惰性一社会发展受阻”。^②这种论调简化了社会保障力量的内容构成与影响因素,是在制度力量、人性心理和现代文明认知上“以偏概全”的结果。在享受社会保障权益是公民正当权利的现代社会,将需要帮助和支持的弱势群体视作“懒汉”,必然导致对“福利不足”状况理所当然地忽视,这对弱势群体无疑是极大的不公。简单、粗暴地给社会保障贴上负面的标签无疑是戴上了有色眼镜,也会掩盖真正的问题,阻碍福利中国的建设进程。“福利病”不是病,社会保障力量的探讨有必要从澄清一系列认识误区开始。

二、起点:社会保障力量源于质量而非数量

从语言文字来看,“福利病”论调否定和打击的范围无疑是巨大的。深入研究发现,其在逻辑推理上所暴露出来的认知误区和局限也是多层面的。

(一)如何评价社会保障水平?

如同血压、体重等各种身体的健康监测指标应该处在有上限和下限限定的合理区间,强调社会保障供给在数量上适度无可厚非,但“福利病”论调对数量的强调是单向度的,似乎只有“高”福利病才是“福利病”,这种数量上单向批判会造成“福利不足”状况被忽视。这种忽视对社会的弱势群体来说极为不公,也会令他们的处境雪上加霜。

1. 现状是福利不足而非福利过度。被诟病的“福利病”保障项目多是针对长期失业、贫困群体的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基本的保障项目,与作为集合名词的“福利”的任一口径都难以匹配。从我国实际情况看,不论是低保标准还是失业保险待遇都远未达到国际公认的一般水平。2021年第二季度,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只有693.5元/月,仅为2021年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19.34%;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6150.4元/年,为2021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38.65%。^③

2. 保障水平应结合社会需求来判定。“水平”的衡量有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前者指某一个体获得的某一类社保待遇的数量相对于他的需求是高是低,即个体需求满意度;后者是从社会整体层面看供给满足需求的程度,鉴于分配结构对供给效果的重要影响,用供给总量/需求总量这个比值远不如用个体需求满意度的中位数更贴近现实。不同社会的社会保障需求的紧迫性和刚需程度不同。置于共同富裕进程下,社会保障始于风险,长于共担,成于共享。其中,预防与化解超越家庭化解能力的社会化风险是社会保障促进社会公平的基本手段,更准确地说,对不同个体和家庭的抗风险能力差距进行调解、补偿和矫正是社会保障的基本功能,旨在保障安全,消除“恐惧”;社会保障也是实现共享发展成果的重要手段,旨在发展同步,消除“焦虑”。劳动力市场双向选择机制下,劳动竞争力较弱群体的抗风险能力、人力发展能力与社会平均水平的差距主要体现为个人初次分配收入与社会平均收入水平的差距。在遵循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原则的初次分配体系中,个体之间的劳动竞争力差距是劳动收入差距的内在因素,市场的成熟度、开放性和包容度可视为外部因素。^④根

① 对于“福利病”论调,大多数研究者持肯定态度,高举警惕“福利病”大旗;有些存疑者也是宁可信其有,推崇预防为先的态度;明确反对的只有郑功成、宁亚芳等少数学者。

② 陈云凡、陈智:《我国的“福利病”风险及其预防策略》,《开发研究》2016年第6期。

③ 杨立雄:《低收入群体共同富裕问题研究》,《社会保障评论》2021年第4期。

④ 市场包容度是指在初次分配场域中再分配成分和第三次分配成分的占比,以及不同分配机制之间的互动和融合度等。总的来说,劳动力市场越完善,人力资本的使用率和价值实现度越高;越包容,初次收入分配差距的自我弥合能力越强。

据人力资本形成理论,人力资本的差异与成长环境、家庭投入以及教育、公共卫生等公共物品及服务分配等因素密切相关。社会保障水平与社会公平现状、初次分配场域的完善程度以及个体能力离散度、家庭的收入能力等因素的关系可定性、简化表示如下:

社会整体的社会保障水平 = 个体社会保障水平之中位数

个体社会保障水平 = 个体社会保障供给 / 个体社会保障需求

社会保障需求 = 风险化解需要 + 共享发展成果需求

个体社会保障需求 = 个体初次分配收入水平与社会平均初次分配收入水平的差距

个体初次收入水平差距 = 个体人力资本积累差距 * 劳动力市场成熟度

个体竞争力差距 = 家长的劳动能力差距 / 家庭获得的公共资源分配均衡度^①

可以说,当下的社会保障需求是对以往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公共资源分配不均衡、劳动力市场不完善、家庭收入能力差异等的矫正,是对个人成长中资源和机会相对不足的修复。个体人力资本积累的差距逐渐成为影响收入差距、社会地位乃至决定社会阶层分布的重要因素。^②通过收入数量的补充来消除相对剥夺感是社会保障基本的矫正和修复方式。完善的社会保障可以保障两代人之间的人力资本积累和传递,为培养高素质人才提供保证。^③

3. 保障水平取决于制度设计质量。修复方式有效的前提是供给对象的确是需补偿和矫正的人,且需要越迫切的人越能优先得到供给。所谓水平适当并不是数量上的折中,水平高低对应着供给对象、内容、数量等供给要素与需求要素的匹配度。高水平的供给意味着供给与需求的高度匹配,是高质量制度设计的结果。从数量到质量至少还隔着分配伦理、资源结构和分配方式等因素。所谓高质量就是达到了质和量相得益彰的状态。

(二) 如何看待制度的力量?

制度是一种治理工具。社会保障同卫生事业、教育事业、应急管理、经济制度、国防系统等一样,都是治理手段,每种手段都有自己的作用方式和效能局限,但唯有“福利”被当作“病”的限定词,无疑是对制度认知的局限,特别是对社会保障制度认知的局限,这种认知局限也会蒙蔽和掩盖真正的问题——如制度质量不高、制度之间协调与衔接有缺陷、制度履行不充分等问题。

1. 理性看待制度的力量

“好制度能让坏人做好事,坏制度能让好人做坏事”是关于制度力量颇为经典的表述,整体逻辑明确且确定,但“让”字的弹性易让人误会,制度能从多大程度上屏蔽人的道德特性、“主导”行为的输出功效?客观地说,“让”更多地意味着引导、影响和激励,而非必定和必然,两者之间存在相关性但不一定构成因果关系,“相关性”不等于“因果性”。众所周知,人的血压、体重只是人体的表征、症状和“果”,而非“病”和“因”,引起血压和体重脱离正常范围的潜在病因很多且呈现明显的个体差异。尽管结果相同,但每个人的“病因”可能不同。与身体健康一样,每个人精神力量的形成也是一系列因素长期叠加的结果。按照“福利病”论调,高福利是因,“福利病”是果;“福利病”是因,“养懒汉”是果。“福利病”论调包含的因果关系禁不住让人产生如下疑问:福利水平能屏蔽认知、教育、家庭关系等一系列因素从而完全决定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吗?如何判定一个人是“懒汉”?如何确定“懒汉”是福利高而不是成长过程中家庭、社会支持缺位造成的?如果能证明有些“懒汉”确实是福利高造成的,那如何证明高福利只造成负向激励、催生了“懒汉”,而没有正向激励其他参保人成为“勤奋”的进取者,以及未受激励、没有产生任何变化的参保者?如果存在多个方向的影响,要定性评价一个制度对社会的影响则要看它的主旋律和大概率,如何证明“懒汉”的数量确定多于后两者的总和?显然逻辑链条存在重大缺陷,即“福利病”论调在没有全面认

① 指引起人力积累差异的、直接面向孩子或家庭的保障、补贴、支持、教育福利以及就业关联福利等,公共资源分配均衡度越高,不平等的预防能力越强。

② 杨晶、邓大松、申云:《人力资本、社会保障与中国居民收入不平等——基于个体相对剥夺视角》,《保险研究》2019年第6期。

③ 宁亚芳:《高社会福利水平创造强国家竞争力——基于瑞典的实证研究》,《中州学刊》2013年第5期。

清制度以及制度力量传导过程全貌的情况下,竟然把可能的影响夸张成绝对的必然结果。

2. “宽容”是一种重要的制度力量

“福利”文字本身就蕴含着幸福、利益之义,是“前缀”最多的社会政策系统。各种分类标准下的群体类型、各种保障内容、保障形式、性别、城乡、地域、行业、职业、个人特性等维度都可以与福利组合,如女性福利、职业福利、家庭福利等。福利的延展性和弹性毋庸置疑,如同长寿、平等一样,福利也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追求。如在一些高收入国家,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提供包括各种弹性工作安排的家庭友好福利。^①置于我国社会保障语境下,狭义的社会福利也呈现出“无门槛、无差别、无义务”的三无特征,是最宽容、包容的子系统。很多人可能一生不会申请低保,不会接受社会救助,不会申请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但其生命历程的大部分都沐浴在有形和无形的福利之中,都受到福利的体恤和慰藉。福利性是社会保障的第一特征,既代表“所得大于所费”的物质文明,也传达着延展、开阔和宽容的精神力量。宽容不仅是一种关乎社会善治水平的重要社会资本,^②也是现代制度重要的价值取向和伦理品质,是一种重要的制度力量。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经济学家霍兰德(Alisha Holland)认为,宽容是对弱势群体的一种再分配。^③在制度执行上对强者适度严苛、对弱势群体适度宽容,也是制度调剂社会力量差距、矫治公共物品分配不均衡的一种作用方式。宽容理论的逻辑前提是理性有局限、制度有局限,但制度局限不能由弱者买单,而要靠增加制度的“感性”来弥补。

(三)如何看待人生状态的阶段波动与现代社会的文明发展?

“人往高处走”是被马斯洛需求层次论和人力资源发展理论充分证明的规律。如果真的有少数贪图不劳而获的“懒汉”诱使辛勤工作的人心理不平衡,也逐渐丧失进取心,成了“懒汉”,那显然是人类的异化,是整个社会病了,是社会的价值体系、信念体系、信用体系的整体失效,是教育体系、支持体系的系统崩溃,岂是福利太高惹的祸?

1. 辩证、长远地看待“懒惰”

在绝大多数人的生命历程中,进取向上是主旋律,阶段的“懒”和“摆烂”只是小插曲,把“懒”置于更宽广、更长远时空下,会发现“懒”可能是很多人前进途中的伴随性、阶段性状态,是休养生息、生命力修复的有效手段,具有积极意义。比如,“摆烂”是当下年轻人的热频词汇,背后是即使奋斗也无法改变困境的心态,但从语言文字的应用和传播来看,“摆烂”又充分体现了年轻人勇于挑战、求新求异的个性特点,在相当程度上,“摆烂”是身处压力环境下的青年群体对自身焦虑状态的宣泄和调侃,是释放内心压力的出口,有助于调整心情重新出发。^④

2. 深刻认识心理修复规律

工业社会是竞争的社会,整个社会被纳入到竞争系统之中,社会成了“相互伤害”的平台。合作的社会是风险高度不确定社会中对“共同善”的追求。^⑤合作而非竞争是人类社会文明不断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不同层面有不同的合作方式,但都发端于社会善念。^⑥当社会善念行为被接受者识别时,他们就能感到自己的自主性得到了尊重和保护,易于产生积极性情绪,增进信任感。低社会善念会导致厌恶感加剧,造成社会成员之间的疏离。^⑦俗话说,人穷志短、穷困潦倒,心理的修复需要物质资源的支撑,物质资源虽不是充分条件,但无疑是必要条件。对于精神贫困者,进一步削弱物质保障,是会激起他们奋斗的热情,还是会让他们走向绝望?从人力发展规律来说,稳定的物质供

① 许晓丽、李亮亮等:《企业家庭友好福利研究新进展:社会视角的影响因素及效应回顾》,《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21年第2期。

② 严挺、卢春龙:《中国的社会宽容及其对公共参与的影响》,《学习与探索》2022年第1期。

③ Alisha Holland, "Forbearan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110, No.2, 2016, pp.232-246.

④ 夏凡凡、马曼娇:《网络流行语“摆烂”的多角度分析》,《汉字文化》2022年第12期。

⑤ 张康之:《在风险社会中看人的道德及其善的追求》,《河南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

⑥ 社会善念是个体与外界互动中充分善意地关注、尊重并保护他人选择的需要和权利的行为准则。

⑦ 窦凯、刘耀中、王玉洁、聂衍刚:《“乐”于合作:感知社会善念诱导合作行为的情绪机制》,《心理学报》2018年第1期。

给和智慧的供给过程能传达更多温暖和善意,提升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内化为更多的精神力量。

3. 正确辨析社会制度文明

一个社会如果以放弃弱者、扶持强者来求发展,只可能富,不可能“强”,^①更谈不上“文明”。一个有免费午餐的社会才是文明社会,弱势群体生活状态代表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已是共识。对于社会性弱势群体的成因、对于制度的低效进行系统性、协调性的反思才是文明的态度。社会学的归因理论认为,如果一个社会提供其成员通过自主性努力达到成功的机会越多,失败者越有可能将原因归于自身并更加努力;反之亦然。^②从这层意义上说,精神力量也是一种再分配资源。精神力量贫乏与物质资源不足的成因一样都兼具社会性和公共属性。因此,帮助弱势群体重振生活信心,为他们提供一个合理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空间是政府、社会的义务和责任。^③据此,社会性弱势群体的形成更多归因于社会还是归因于个人更文明?有免费午餐的社会还是没有免费午餐的社会更文明?午餐丰富的社会还是午餐单调的社会更文明?答案不言自明。

“福利病”论调的逻辑,不合情理,更不符合现实。社会保障力量来自社会公平目标的实现,目标实现度取决于社会保障质量的高低;人力成长是质量到力量的桥梁和媒介,也是质量和力量的载体。在隐秘的能量场域中,社会保障力量通过人力的流动和行动与其他系统互动融合,将社会公平带入到更广阔的领域,人力无疑是社会保障力量的载体。以社会保障质量为起点的社会保障良性发展循环可概括为“社会保障质量—社会公平促进—人力成长—社会保障力量—社会生态优化—社会保障质量提升”。现有的社会保障质量研究大多脱离社会保障力量传导和作用实景,就质量谈质量,对社会保障项目采取罗列式、单层的分析,忽视社会保障质量的关键节点和深层指向。^④鉴于此,聚焦社会保障的质量向力量的转化过程,并从不同资源层面提炼出社会保障力量的传导路径是社会保障力量研究推进的重要节点。

三、过程:社会保障质量—力量传导的两个层面

积极的行动改变世界,一个社会良性发展的过程就是人力成长—行动的良性循环:“人力资本投入—人力资本增长—人力资本价值实现—人力资本投入”。社会保障对人力的影响全面而深刻,从健康资本到能力资本再到心理资本都离不开社会保障制度的支撑。社会保障力量的传导过程实质是全面改善人力资本、增加社会的积极心理资本存量并促使其转化为精神动力、输出积极行为的过程。从资源和力量的存在形式看,社会保障质量水平分别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影响人力成长效率,进而影响社会保障力量的输出。

(一) 物质层面:“物质转移—收入平等—人力改善—经济循环”

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过程是物质资源的再分配过程,人力成长导向下进入社会投资良性循环的社会保障具有这样的物质力量:“物质转移—中低收入者可支配收入增加—健康、教育等人力资本增长—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比如,居民的消费倾向和公共福利支出紧密关联,社会保障通过物质转移刺激居民消费,在这一点上,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理论、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理论和以卢卡斯、萨金特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理论等都为之提供坚实的依据。^⑤新冠疫情以来,很多国家都采

① 张益刚:《弱者的“强势”——政府维稳与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关系论》,《齐鲁学刊》2013年第5期。

② 王奋宇、李璐璐:《当代中国制度化结构体系下的社会心理特征》,《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1期。

③ 张益刚:《弱者的“强势”——政府维稳与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关系论》,《齐鲁学刊》2013年第5期。

④ 比如,丛树海提出高质量养老保障的具体内容为“钱、医、人”三位一体,即筹集养老资金、建设社区医疗网点和培养专业护工队伍。张光进指出,应主要从省级统筹、规范管理和扩围提标上持续用力,积极探索完善灵活就业社会保障政策,加快失业、工伤保险全覆盖。张浩森指出高质量社会救助制度应立足于现有“8+1”项目体系,适当扩充整合相关救助内容,调整为基本生活救助、专项社会救助和急难社会救助三个部分;卫小将强调要加强制度化建设,充分发挥国家、市场、社会、家庭及个体等多元主体的福利协同功能,充分调动社会组织团体积极性,构建完善社会福利网等。参见丛树海:《新时代我国养老保障高质量发展的内容、体系和机制》,《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张浩森:《以高质量社会救助制度筑牢共同富裕底板》,《学术研究》2022年第9期;卫小将:《中国福利发展的动因与机理》,《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2年第5期。

⑤ 杨胜利、李正龙、吕栋鑫:《我国社会保障财政支出规模研究》,《改革与战略》2010年第9期。

取了加大社会保障补贴和支出的措施,说明社会保障物质转移具有激发积极消费行为的功效。理论上,风险化解有补需方和补供方两种方式,之所以补需方能够成为主流,因为其在物质资源流动上能带动更多环节进入循环链条,有助于拉动经济。值得注意的是,任何一个环节的断裂都会阻断这个循环,而两个节点之间的连接并不是自动形成的,还需要更深层因素的支撑。下面我们将考察我国社会保障物质转移过程中的多个环节,以期找到节点之间断裂的可能原因所在。

1. 再分配必能提升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吗?

不得不承认,一些社会保障项目已呈现出逆向再分配特征。以医疗保障供给为例,新农合的实施改善了农村地区未成年人的整体健康状况,但有研究者指出,不同收入家庭中未成年人群体间的健康差距仍在扩大,社会医疗保险制度似乎在加剧未成年人健康不平等现象。^①中国多重分割的社会保险制度反而导致贫富差距,风险更高的社会成员所获得的保障反而比那些风险更低的人更少。^②不论是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是民间主导的慈善公益事业,一些信息、认知上的最弱势群体往往游离在外。^③

2. 收入增加必能促进人力改善吗?

健康改善是人力成长的重要内容。2020年全球新发癌症1929万例,其中中国新发癌症457万例,占全球23.7%,^④超过我国人口总量在世界总人口的占比(18%)。中国精神卫生调查显示,目前我国患抑郁症人数9500万,每年大约有28万人自杀,其中40%患有抑郁症,五成抑郁症患者为在校学生。青少年抑郁症患病率已达15%~20%,接近于成人。抑郁症发病群体呈年轻化趋势,社会亟需重视青少年心理健康。可见,收入增加并不一定带来身安,身安也不一定带来心安,但心不安身必难安。众所周知,经常性的心情低落会使身体状态变差,因为大脑中负责管理情绪的杏仁核,也调节着心血管系统和免疫系统。客观地说,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相伴而来的住房、医疗、教育压力也从未走远,无助的家庭,“时间饥荒”的职场妈妈,被应试教育包围的未成年人等都具有脆弱的心理状态。“空心病”已成为当代中国青年突出的心理问题,表现为人生无意义感强烈以及价值虚无主义。^⑤值得注意的是,“空心病”并不是缺少精神需求,而是精神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和精神表达愿望上的强烈缺失感所致。

3. 人力发展必能促进经济循环吗?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对世界最富裕国家恩格尔系数的城乡平均水平界定,中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已经与世界最富裕国家大体相当。^⑥为什么恩格尔系数在我国所表征的意义有些变形?既有统计口径、方式等技术局限,也与收入差距过大及社会保障不完善带来的不安全预期有关。^⑦不安全预期下,消费意愿被压缩到极致。近年来我国教育人力资本存量逐年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增速放缓,与发达国家人力资本依然存在差距,^⑧且人力资本存量的整体产出效率不高。人力资本的潜在价值能否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使用和产出效率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宏观上说,我国的“物本经济”还没有充分转向“人本经济”,从人力资本投资效应看,我国还未完全走出“中等收入陷阱”。^⑨以北京市为例,物质资本投资、教育人力资本存量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平均贡献率分别为59.87%、17.84%。^⑩有研究显示,在我国,没有任何一个地区的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质量有显著影

① 彭晓博、王天宇:《社会医疗保险缓解了未成年人健康不平等吗》,《中国工业经济》2017年第12期。

② 李棉管、岳经纶:《相对贫困与治理的长效机制:从理论到政策》,《社会学研究》2020年第6期。

③ 杨方方:《慈善市场的信息不对成与结构性失衡研究》,《社会保障评论》2017年第3期。

④ 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官网, <https://www.cn-haltcare.com/articlewm/20220321/content-1328590.html>, 2022-11-05。

⑤ 李海艺:《青年“躺平”现象的生成逻辑与引导策略》,《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⑥ 黄彦彦、郭克莎:《家庭负债与恩格尔系数分化——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证据》,《经济动态》2021年第11期。

⑦ 张磊、赵悦辰、范淑娟、黄嘉俊:《到底是什么影响了恩格尔系数:基于多因素的经济学和OLS分析》,《上海商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⑧ 刘伟、张立元:《经济发展潜能与人力资本质量》,《管理世界》2020年第1期。

⑨ 倪超:《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投资效应研究——基于65个国家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6年第15期。

⑩ 胡捷、高丛:《教育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北京市为例》,《质量与市场》2022年第16期。

响。^①客观地说,人力资源配置上存在的结构性失衡和地区性失衡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人力资本价值实现的整体水平。但在双向选择的劳动力市场匹配机制和共享性学习资源足够丰富的当下,人力资本价值实现度不高不仅源于宏观上受落后的就业观念影响、就业配置能力低,还和人岗匹配后个体的内在动力不足、心理状态和精神状态较差有关。

可见,每个节点都需要更深层力量的推动,这种深层力量比物质力量更富流动性,是物质资源“量”的延伸和归途,是量到质的“转换点”。显然,这种深层力量就是精神动力。根据人力行为决策理论,符合人力行为的主观意愿、意志、心理、精神状态是决定人行为选择的直接因素。精神力量比物质力量更具有主导性,精神因素是生命的支点,物质层面的资源传递只有内化为积极的精神力量,才会产生积极的行动。精神力量与物质力量紧密关联,精神力量离不开物质力量的滋养和培育。研究表明,心理异常的高发人群多是身体健康状况差,患有某些慢性病,没有职业,没有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商业保险的中青年群体。^②社会保障已经成为风险社会心理健康的坚实支撑。弱者、贫者可以通过政府和社会给予的社会保障条件,使自己自尊、自立、自强起来。^③直抵人心、对心理和精神层面进行修复是物质层面修复的深层指向。社会保障始于风险共担,成于成果共享;始于物质力量的传递,成于精神力量的唤醒。当社会成员相信暂时的困难有终点,相信不幸有底线,相信平庸不妨碍尊严,就拥有了对抗未知和不确定风险的确定力量。

(二)精神层面:“身安→心安→心动→行动”

在个体层面,物质力量向精神力量的传递过程可概括如下:即“物质转移—公平感知—精神与心理变化—行动与选择”的影响链条。整体社会的精神力量就是个体精神和心理影响的叠加和综合。理想的传递链条可归纳为:“正向的收入再分配—公平感提升—个体精神力量增强—社会发展的乘数效应”。精神力量是社会保障力量传导过程中的重要节点,正是精神力量的穿透力和渗透性,推动着社会保障力量的传导过程,促使社会保障力量在不同的系统中流动。例如,在扩大内需、科技创新和教育优化中,社会保障的促进作用主要在于其形成的积极精神力量是这些领域走向良性发展的底层支撑。精神力量的形成与输出影响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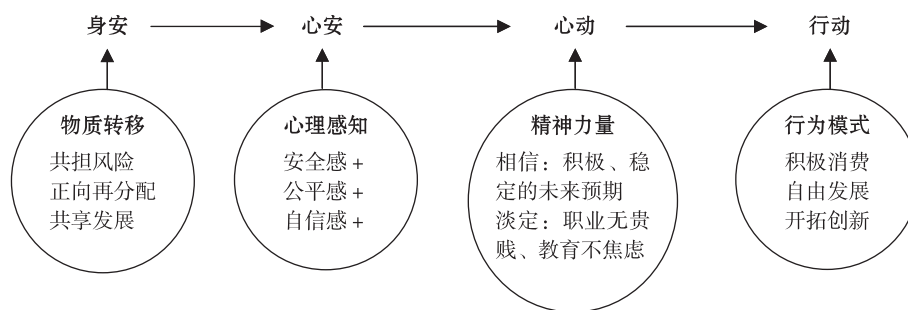


图1 社会保障力量的深层传导

每个系统的良性发展除了要看内部的逻辑自洽和良好追求,还要看其他系统能否助力,特别需要基础制度的有力支撑。有限的、被动的、补偿型的社会保障项目看似无足轻重,实则像拽着风筝线的手,从根本上影响整个社会的教育观、职业观、成功观,牵引着每个个体的人生方向。

1. 安全感提升—相信未来会更好—积极消费

在扩大内需上,我国存在的主要问题:高收入群体逐步扩大,虽有较高的消费能力,但国内消费意愿低,多由海外供给;低收入群体虽有消费需求,但支付能力有限。^④对于中低收入者而言,提

① 张鸿帅、张思源、王春枝:《人力资本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教育与健康资本的双重视角》,《统计学报》2022年年第2期。

② 卓朗、张训保等:《苏北地区失地农民心理异常与社会保障多因素研究》,《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9年第11期。

③ 吴越:《社会保障体系的心理工程:共生共存论》,《学习与探索》1998年第4期。

④ 王莉:《构建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研究》,《商展经济》2022年第17期。

高突出社会保障再分配功能,增加社会保障待遇水平,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消费能力,并不必然产生积极的消费行为。消费的关键是心安,消除后顾之忧、消除不安全的未来预期。身心相连,身安是心安的前提之一。风险的不确定性导致每个个体与各种风险情景联结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意味着只有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和稳定才有可能提供“确定性的身安”。稳定的“确定性的身安”形成“心安”,心安会滋生愉悦的情绪,容易产生积极的预期。有了积极的预期,没有消费能力也会创造消费能力,如贷款买房、教育或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等。再看高端消费需求,我国每年流失的奢侈品消费高达几百亿美元。2010年3月至2011年3月,世界奢侈品协会调查了法国、意大利、英国主要区域奢侈品商业的消费数据,发现有效购买数据中48.8%以上为中国人。^①要想高端消费不流失,就需要品牌升级,品牌升级就需要有眼光和胆识的企业家,需要宽松的市场投资环境,需要行业专业人才精英。一句话,需要良性的社会生态环境。毫无疑问,优质的教育体系是良性社会生态重要的基础制度支撑。

2. 公平感提升—淡定不焦虑—教育真谛回归

教育本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关键机制,^②但当前我国教育资源配置方面仍然有很大的优化空间。有学者研究北京大学新生录取花名册数据发现,家庭出身为农民的学生比例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后开始出现明显下降趋势。^③同时,农民子弟在获得“985”“211”高校优势教育资源上的教育机会亦呈现下降趋势。^④未成年时期的教育脆弱可能会影响和延续一生,成年后逆袭是低概率事件。诚然,我国社会存在着普遍且深刻的教育焦虑,既是就业压力、职业焦虑、家庭焦虑的投射,又会折射出新的焦虑源,如婚姻焦虑、生育焦虑等。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双减”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家长原有教育焦虑的同时,也会制造新的教育焦虑。^⑤教育焦虑的形成可以追溯到社会保障的板块分割和统分失度:“不同职业社保差距大一职业有‘贵贱’—就业偏好趋同一教育背景攀比—应试竞争激烈—教育焦虑”。在社会大众的认知体系中,社会福利水平高的职业就是社会地位高的好职业,而游离在外的职业很难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反过来说,板块分割、统分失度的再分配系统必然带来社会认同上的不均衡,导致职业偏好集中在社保待遇优势的部门和行业。“考公热”是这种现象的一个集中反映。2012年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公务员考试有46个招录职位的报考比例超过1000:1,2013年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公务员考试有109个招录职位的报考比例超过1000:1。^⑥从2017—2022年的数据来看,平均每年约有161万余人报考,工作稳定、体面、福利待遇好是公务员报考热的主要原因。^⑦风险不断流动的本性决定了就业竞争压力必然会传导到教育领域。人才竞争的教育门槛就会水涨船高,层层传递下去,产生“不要输在起跑线”且“不断刷新起跑线底线”的教育焦虑自然不足为奇。^⑧只要教育焦虑没有消除,追求应试竞争资源的需求就存在,提高应试能力的方式有很多种,一种方式被人为取缔,必然会滋生其他的替代方式,因为应试教育的土壤没有改变。在“目标上的高度单一,价值评价体系的高度单一,竞争方式的高度单一”的应试压力下,^⑨学生的学习效率和身体素质都深受其扰,更深层的伤害是精神生命层面,不仅天性和活力被消磨,对知识的好奇心与自由探索热情也被消耗。

与教育焦虑的形成链条相对应,解决路径也得从社保切入:“社保的社会性差异消除—职业无贵贱—就业偏好不再集中—教育焦虑缓解—教育真谛逐渐回归”。当职业性质与养老保险的关联度

① 吴筱静:《流失的奢侈品购买力》,《新财经》2011年第7期。

② 李棉管、岳经纶:《相对贫困与治理的长效机制:从理论到政策》,《社会学研究》2020年第6期。

③ 刘云彬、王志明等:《精英的选拔:身份、地域与资本的视角——跨入北京大学的农家子弟(1978—2005)》,《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9年第5期。

④ 清华大学课题组:《让每个学子都拥有公平的机会》,《光明日报》2012年7月3日,第15版。

⑤ 方紫琼、刘济良:《“双减”政策视域中的家长教育焦虑:表现、成因及纾解》,《成都师范学院学报》2022年第9期。

⑥ 数据转引自汪春梅、金艾裙:《“公务员热”现象下的大学生就业观教育》,《池州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⑦ 数据转引自黄真、杨璐娜:《大学生“公务员报考热”现象探究》,《黑龙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2022年第13期。

⑧ 杨方方:《共同富裕背景下的第三次分配与慈善事业》,《社会保障评论》2022年第1期。

⑨ 覃鑫渊、代玉启:《“内卷”“佛系”到“躺平”——从社会心态变迁看青年奋斗精神培育》,《中国青年研究》2022年第2期。

被弱化后，不同职业之间能够获得相同或相近的社会认同，进而淡化职业的“贵贱”之分，职业趋向偏好就不再集中，家庭在教育规划上自然越来越从容淡定。学校、老师、家长等各个主体的角色也将逐渐回归，对于成功的理解自然愈加开放，教育的真谛逐渐回归，孩子的天赋、兴趣、爱好和志向就能得到尊重和自主发展。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存量和实现的人力资本价值自然就“水涨船高”。

3. 信念感提升—好奇探索—开拓创新

实践层面看，科技创新是科技生态良性循环的自然结果：“科技研发—科技投资—科技制造—科技应用”。每个环节都不可或缺，每个环节都离不开人、制度、环境的积极良性互动过程。以科技投资为例，其内在的推动力是现代企业家的冒险精神、创新精神和资源环境意识等。^①同样在科技研发环节，创新最直接的推动力是科学认知上的好奇与探索热情。从科研规律上看，思维上开阔、富有想象力以及强烈的科研兴趣和内驱力是重要的根能力，而这些根能力更多形成于引导、唤醒型的“全人型教育体系”中，而绝非应试教育的产物。从心理学角度看，这种探索热情是知识自信、能力自信的产物，而自信的形成是社会认同与自我认同相互强化的结果，是身体健康和生活舒适等基本需求充分满足后内在需求的自动升级。从物质和精神层面来看，研发创新与直接的科研投入之间并不存在显性的线性关系，而更多关乎基础环境，需要宽松的家庭环境、职场环境和社会环境。从需求层次发展规律看，创新来自高层次精神需求的不满足，精神世界的冒险和探索意味着主动走出舒适区和放弃一部分精神层面的安全感去未知的世界里开拓，是在努力实现自我价值，是追求最高层次需求的满足。显然，只有在低层次需求充分满足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滋生更高层次的需求。虽然从个体角度说，焦虑和恐惧也能部分转化为进取心，但恐惧或许能催生奋进和自律，而唯有愉悦才能更多地酝酿突破、跨越和创新。

（三）物质到精神的内化：社会保障质量向力量的转化

社会保障力量的形成与传导是社会保障质量分别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向进行资源传输的过程。更准确地说，是物质内化为精神、精神又外化为物质的循环。相对而言，物质到精神的内化具有主导性，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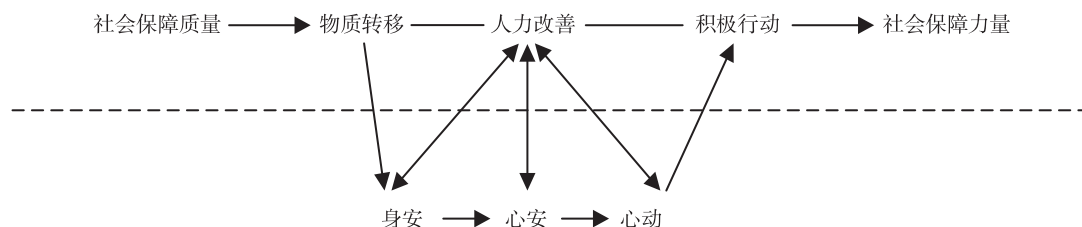


图 2 社会保障力量的传导过程^②

社会保障力量传导过程呈现如下特点：一是物质力量传递链条中每两个节点之间的传导是靠内化出的心理和精神力量推动；二是心理和精神力量的产生一般需要物质基础，越是普遍和基础性的精神力量越离不开物质层面稳定的供养和投入，但精神力量存在超越性，也可能由心理能量内升而来；三是精神力量的形成存在个体差异，同样的物质资源与复杂、丰富、个性化的心理世界结合很可能内生或内生出不同层次的精神力量。

社会保障质量到力量的传导过程就是物质力量内化为精神力量的过程，是参保对象从接收物质力量到输出精神力量的过程。制度的力量是通过物质提升精神力量、激发更多积极的行动来实现的。虚线上面是“看得见的传递”，虚线下面是“看不见的传导”，“看不见”的传导更具主导性。物

^① 曹艳：《创新驱动战略实施的持久推力：现代企业家精神的社会内化》，《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2 期。

^② 有箭头的连接线表示两者具有内生关系；无箭头连接线表示前者难以内生出后者，需要外力推动。

质资源转移不仅能影响参保者的生活状态，还将触动其安全感、公平感等心理感知，心理感知（身安一心安）是物质力量到精神力量的桥梁。心理是个体对客观物质世界的主观反映；精神是个体对改造物质世界的主观活动，是心理感知的内升和主观能动化。无论是心理能量的形成还是精神力量的输出都是复杂的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但在其他因素差不多的情况下，增强社会保障的心理能量能促进物质资源向精神动力的转化。作为化解社会普遍性风险的制度，需要在效用观约束下找到符合人类心理共性的供给方案。公平感、尊严感、信任感、认同感等都是共性的心理需要。一般来讲，物质供给的充分、稳定和可持续性，供给程序的简化，供给过程能做到智慧、尊重、开放和隐性就能传达更多的心理和精神能量。^①

四、指向：富含心理能量与精神意蕴的社会保障

基于以上分析，最大限度地增强参保对象积极的心理感知和促进心理能量转化为精神动力是质量提升的整体思路。从体系构成上看，社会保障三大子系统之间的目标各有侧重，既要各司其职，又要相互协调：社会救助属“亡羊补牢”，旨在满足生存安全，进行心理修复和精神补偿；社会保险属“未雨绸缪”，旨在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增加确定性的积极预期；社会福利属“锦上添花”，旨在满足发展需求和较高层次的生活需求，提升福利感和幸福感。从运行需要上看，制度内容分为两大板块：实体部分和程序部分。正义的社会保障是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共同作用的结果。“实体”与社会保障的内容、数量相连，指物质资源的分配方案；“程序”指分配方案运营过程中遵循的原则、规则和流程等，是实体从权利“文本”转化为实际获得感的桥梁和媒介。从对分配结果的影响来看，实体增进起到增量效应，程序改进则能发挥乘数效应。实体正义是舟，程序正义是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一）从“身安”到“心安”：方案的心理能量 * 运行的心理能量

这一环节的流畅度主要取决于物质转移能产生多少心理能量，取决于物质分配方案设计的心理指向度和运行环节心理指向度。^② 基于已有研究，将社会保障能够衍生的积极心理感知细化，并结合我国社会保障运行现状，指出分配方案设计和运行方案设计中关键要点及应遵循的具体原则，部分内容详见表 1。

表 1 社会保障的心理指向与设计原则

心理指向		总体原则	子系统原则		
			社会救助	社会保险	社会福利
分配方案	安全感 公平感 认同感 福利感 幸福感	广覆盖	动态性，有进有出	需求普遍，全面推进	回归生理性 凸显公共性 多维度供给 相对无差别
		数量充足	救助标准科学	统分得当、合理差异	
		所得大于所费	权利义务的单向性	缴费负担不会降低当下生活质量（低收入者）	
		满足人力发展需要	供给内容丰富	鼓励发展补充保险	
方案运行	获得感 信任感 尊严感 责任感 价值感	充分履行、应保尽保规范化、法制化健全权利保障渠道简化服务流程提高制度效力	主动发现，不遗漏 ^③	加强社会保险监察，与险种特点相适应的基金平衡原则，统筹层次提高，跨地区接续通畅	无门槛、无义务、无差别；打通不同群体的服务边界，无缝衔接起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障与民间慈善事业
			减少“土政策”		
			审核流程“隐性”化		
		充分履行具有自主选择或参与空间	专业的社工服务人力发展助力服务，如再就业服务	信息对称，知情权有保障；可以参与养老个人账户运营等	

① 杨方方：《慈善力量传递中的义与利：相融与相生》，《社会保障评论》2019 年第 4 期。
② 心理指向度指实际的心理能量与理想的心理能量之间的比重，是对制度心理能量传递能力的定性说明。
③ 林闽钢：《中国社会救助高质量发展研究》，《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4 期。

1. 分配方案“精于心”

社会保障的分配方案可以带来安全感、公平感、认同感、福利感和幸福感等积极的心理能量，前提是遵循了科学的设计原则，对于分配方案中一些关键心理能量点解释如下：

供给数量上，协调好“绝对量”与“相对量”的关系。绝对量意味着个体收入层面的绝对变化；相对量意味着不同个体的变化幅度高低。社会保障再分配在正向的前提下才有意义，相对量会引起个体的判断和比较以及服务过程中社会保障供给方式的感知，会引起心理状态的变化。以对个体消费行为的影响为例，绝对量影响客观层面上的消费能力，相对量影响主观上的消费意愿。“不患寡而患不均”，相对量引起的公平感更为强烈；绝对量则更关乎安全感。

比较维度上，协调好“群体内部”与“群体外部”的关系。从个体层面看，其参照的对象一般是具有同质性的群体内部同类或向上攀比，受更高收入群体的引领，很少向下比较，而相对而言更易与更弱势的人共情。从这层意义上说，对最弱势的群体适当宽容不会引起效仿，“福利病”论调中懒惰会传染，造成整体人力“下拉效应”的看法纯粹缺少支撑。值得一提的是，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对公平感知的强势维度不同，从社会层面看不同维度的公平重要性，不同群体之间的公平感知往往大于同一群体内的公平感知；^①而个体心理规律是由己及人：绝对量—群体内相对量—不同群体之间相对量。鉴于此，高质量的社会保障供给方式应该是“同步推进，不遗漏任何群体，力度上向弱势群体倾斜”，不同群体之间的公平和群内的公平同步推进。分配伦理上，奉行弱者优先，毕竟弱势群体之间的关联转化度和照护依赖度高。

在统分度上，协调好“生理性”与“社会性”的关系。不同群体的抗风险能力不同，保障方式和过程的“合理差异”恰恰是对起点差异的矫正，能实质性地推进结果公平。根据弱势的不同成因，弱势群体可分为生理性弱势群体、社会性弱势群体和区域性弱势群体；生理性弱势群体是弱势中的弱势，因为生理上的局限会从根本上限制一个人自主参与社会建设、融入社会发展的能力。^②比如在养老保险模式和待遇上，应淡化社会性区别，强化生理性差异，在保持基础保障模式一体化的基础上，应根据生理差异，调整待遇计算方法、领取资格等。

另外，在供给内容和形式上，丰富、多元化能更好地匹配个体化差异的需要，产生更多的积极的心理感知；自主选择权越多，心理能量越大，应在第二、第三层次的社会保险以及社会福利中给予个人更多自主选择空间；“雪中送炭”先于“锦上添花”，优先帮助需求最紧迫的人，并避免以居高临下之姿误判弱势群体的需求，这不仅是人道事业的核心原则，也是福利效用最大化的现实要求。提高社会保障的实用性，也能从根本上减少劳动市场中的边缘群体的相对剥夺感，提高社会保障的社会遵从度。

2. 运行“简于形”

社会保障的充分履行、完全落地过程中，各个子系统、项目运行原则之间的自洽性与不同子系统、项目之间的协调性同样重要。可以说，运营过程存在更多心理敏感点。但从参保者角度看，手续、流程越简约则服务质量往往越高。“精于心、简于形”的背后恰恰是充分的尊重、信任和用心良苦的设计以及强大的信息整合能力、技术支撑等。^③以老年人和残障人士为例，如果《老人年证》《残疾人证》能与身份证合并当然更便捷。而支撑这份便捷的是强烈的服务意识和复杂且周密的信息系统整合。运营过程中如下一些点也值得说明。

低保资格审核流程应“隐性化”。社会救助是“亡羊补牢”，提供生存保障，对遭受各种挫折的人进行精神修复，从现有政策和实践来看，低保资格审核环节流程复杂繁琐，加剧了申请者的精神消耗，也加剧了“关系保”“人情保”的横行，低保资格审核在一些地方成了考验人际关系和兑现社会资本的一环。“越穷越光荣”相当程度上是“公示、实际生活监督、民主评议”等一系列社会动

① 杜飞进、张怡恬：《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与效率问题研究》，《学习与探索》2008年第1期。

② 杨方方：《风险传递视角下弱势群体的共同富裕之路》，《学术研究》2022年第9期。

③ 杨方方：《慈善力量传递中的义和利：相融与相生》，《社会保障评论》2019年第4期。

员式程序下久经锻炼的结果。应全面提高行政管理能力,完善信息整合和智能甄别机制,在保证及时、高效的同时尊重申请者的尊严、传达人文关怀,不破坏社会和谐的同时维护制度威严。

基金结余偏好比收不抵支更值得警惕。不同的保障项目化解的风险性质不同,不同项目的基金遵循的平衡原则也有差异。无论是遵循生命周期平衡、逆经济周期平衡,还是年度平衡,基金结余都不是越多越安全,更不是越多越好。从社会保障价值的实现途径来说,基金结余偏好远比收不抵支可怕。社保基金收入是手段,社保支出是目的,社会保障的内在价值是通过支出实现的。“收不抵支”可能会使社会保障目标打折,而基金结余偏好则可能令社会保障的内在价值背道而驰。如果基金出现超常规结余,应从两方面反思:财务平衡原则是否失当,缴费负担是否过重及支出门槛是否太高。

社保权利有救济、有保障。一是社会保障权利始于法定。从法理上言,社会保障属于旨在促进社会利益最大化的社会法,其对弱势方实行倾斜保护原则,立法导向早已从“义务本位”走向“权利本位”。法律是社会保障权利正当、有力的载体,法律生效之日即社会保障权利产生之时。二是社会保障权利成于独立性。权利的独立性意味着每项权利都有独自的享受标准和罚则体系,不应与其他系统捆绑,道德也不能凌驾于社会保障权利之上。无所谓“好人”和“坏人”,任何处于疲惫、困境的人都有在社会保障场域中“充电”的权利。三是社会保障权利终于救济。无救济就无权利,应健全权利救济机制,完善行政复议、调解、仲裁和司法等各种救济机制,其中司法救济是最重要的救济,是社会保障权利可诉性保障。

另外,在社会保障监管上,应该遵循开放、充分沟通的原则,开放程序远比封闭的程序更能产生积极的心理感受。当参保对象的知情权、参与权被尊重,存在感和社会责任增强,人力成长内驱力就会被激发。

(二)从“心安”到“心动”:精神因子+理念接口

“心安”到“心动”的转化过程模式难以捉摸,取决于每个人即时性的心理、情绪和对自身人力水平的感知,也取决于长期形成的精神可塑性,即精神世界的开放度和敏感度,故转化结果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可以说,在这个环节,社会保障更加被动,因为精神力量的形成过程“天马行空”,精神可塑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既往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多个系统在人力成长上的综合积累和沉淀。精神力量的产生既漫长又意外,量变到质变可能是渐进的路径,也可能在某一时刻被外部的火苗瞬间点燃,瞬间顿悟。精神可塑性既与物质基础有关又超越物质;既与先天特质有关,又受环境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保障在这一环节束手无策,毕竟当下社会保障供给的人力改善效果和精神引领作用会影响参保者未来的精神可塑性。积极地看,“天马行空”即“海阔天空”,孕育着无限可能。虽然社会保障与精神力量的连接隐秘且脆弱,看似留给社会保障的可塑“窗口”不大,的确非常考验社会保障的精神能量。但同时也要积极地看到,在持续输出、稳定供给和广泛覆盖等时间、空间因素的“加持”下,基础性制度的观念引领力量不容小觑。

社会保障应举起尽可能多的精神“火把”,聚沙成塔、积少成多,形成累积效应。理念先行,高质量社会保障制度设计应植入更多精神因子,如公平正义精神、生命平等精神和风险意识等,用精细化的制度设计在实现自身目标的同时为其他系统提供互动机会,传达先进的人性观、文明观和发展观,全面、动态地贯彻以人为本理念,为人力成长和发展提供隐秘而又坚实的精神支点和广博的理念感知空间。通过科学、智慧、精细的制度设计让社会保障成为唤起精神力量的“火苗”、孕育精神力量的平台和通向生命平等、性别平等、职业无贵贱、尊重弱者等先进理念认知的接口。如图3所示。

社会保障根制度的特性决定了其能与多系统进行互动并在互动中相互塑造。社会保障的先进精神和理念无疑也能带领其他系统进步,如通过自身结构的不断优化和运作精细化发挥示范作用,以越来越强的社会观念引领能力提升其他系统优化的压力和动力。^①可见,社会保障质量提升、力量壮

^① 杨方方:《风险流动视角下的弱势群体与共同富裕路径》,《学术研究》2022年第9期。

大的过程就是社会保障与其他系统相互促进、共同提升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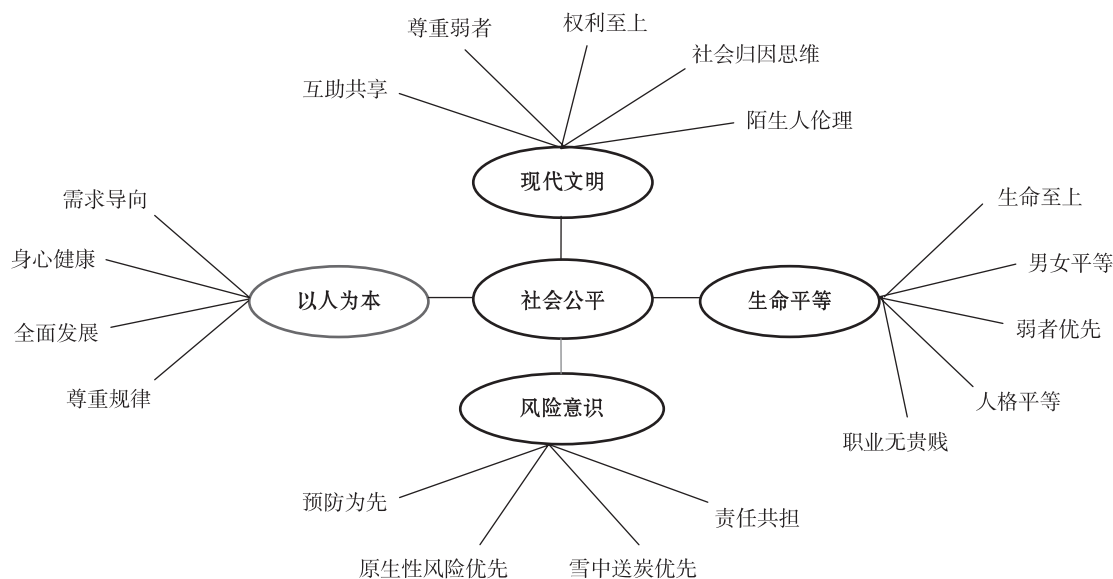


图3 社会保障的精神因子与理念接口

(责任编辑:薛立勇)

Power Transmission and Quality Enhancement of Social Security: A Comment on the Argument of “Welfare Diseases”

YANG Fangfang

Abstract: Social security, undertaking social equity as its own duty, constitutes a vital and basic force to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and achieve Chinese modernization. As the existing research fails to clearly present the action mechanism and transmission path of social security forces, the argument of “welfare illnesses”——“high level of social security supply-facilitating manpower inertia-hindering social development” that distorts social security forces is widely circulated. Since the flow and action of manpower will bring the derivative effect of social equity to broader areas, manpower serves as the carrier of social security forces. In spite of this, the social security forces based on manpower emanates from its quality rather than its quantity, and there are at least factors such as concept value, distribution structure and supply content and method between quantity and quality. The transmission process of social security forces can be summarized as “social security quality-social equity promotion-manpower growth-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In respect of the material level, the power transmission process of social security, i.e., “material transfer-income equality-manpower improvement-economic cycle” is not smooth, and the connection of every two nodes calls for corresponding psychological energy and spiritual power; on the spiritual level, “physical security-peace of mind-motivation” is the pre-transmission link of positive actions. Therefore,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ocial security, it is essential to increase its psychological energy and the spiritual implication. We should also enhance the spiritual internalization rate of material resources and stimulate positive behavior so as to foster the ecology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 a comprehensive manner.

Keywords: Social Security Power; Social Security Quality; Material Transfer; Psychological Direction; Spiritual Power